

汉字学十讲

吕 浩 编著

学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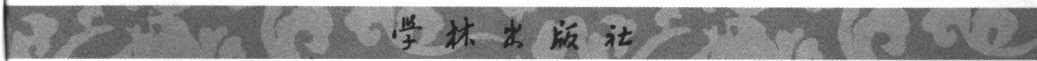


汉字学十讲

吕 浩

编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字学十讲 / 吕浩编著. —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6.6

ISBN 7-80730-135-X

I. 汉… II. 吕… III. 汉字-文字学 IV. 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2961 号

汉字学十讲



著 者—— 吕 浩

责任编辑—— 刘 娟

封面设计—— 严克勤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5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5 万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7-80730-135-X / H·14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出版说明

该套系列教材是上海市中文教育高地——上海大学本年度的重点建设项目,该项目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汉语言文字学等二级学科所属的主要选修课。通过这些选修课教材的建设,达到如下几方面的目的:

一、促使教师科研成果转化为本科教学的内容,增强本科教学的学术含量。

二、更新选修课的教学内容,把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与基础教学结合起来,拓宽本科学生的学科视野。

三、使本科学生掌握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的基本方法,提高研究具体问题的能力。

四、提高本科学生的人文素质,实现人文精神的传承,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爱国精神、深厚文化素养和较强社会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

在上海市教委、上海大学、上海大学文学院各级领导的指导下,上海大学中文系正在为上海市中文教育高地的建设而努力工作。相信该系列教材的出版能为中文学科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期盼得到各级领导和同行专家的批评指正。

上海市中文教育高地上海大学系列教材

编辑委员会

前 言

汉字学是以汉字为研究对象而建立起来的一门学科。古代汉字学是“小学”的一个门类，而“小学”是为解经服务的，并隶属于经学。先秦诸子曾经就汉字的创制问题有一些说辞，如《荀子·解蔽》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韩非子·五蠹》说：“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谓之公。”《吕氏春秋·君守》说：“苍颉作书。”但这些材料显然有着同一个来源，这个说法后来似乎成了定论，以至于《淮南子·本经》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许慎《说文解字·叙》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是不是黄帝时的史官，今已不可考。但许慎说仓颉“初造书契”，这似乎泄露了个中玄机。从语言角度说，这“仓颉”会不会就是“创契”？若是这样，则仓颉与“有巢氏”“神农氏”属于同一个范式，这与他传说中的“史官”身份并不矛盾，至于是不是黄帝时代的人，那是另一个问题了。战国时代的史书《世本》卷一在谈到“苍颉作书”的同时，还提到沮诵，原文为“沮诵苍颉作书”。“沮诵”在汉字造字方面的传说不多，此处既然把他放在仓颉的前面，是否有什么深意？对于谁造字的说辞及其沿革并没有涉及到汉字本身的研究，因此还不能算入汉字学范畴。

《周礼·春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郑注：“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书之文字，得能读之。”孙诒让说：“审声正读则谓之名，察形究义则谓之文，形声孳乳则谓之字，通言之则三者一也。

《中庸》云‘书同文’，《管子·君臣篇》云‘书同名’，《史记·秦始皇本纪·琅玕台刻石》云‘书同文字’，则‘名’即文字，古今异称之证也。云‘使四方知书之文字，得能读之’者，谓以书名之形声，达之四方，使通其音义，即后世字书之权舆也。”《周礼》此处记载了掌管着汉字的史官有传播汉字的责任，其目的是要统一“四方”文字。《礼记·中庸》：“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为了有效地做到“书同文”，周宣王时代的太史籀编著了《史籀篇》，它是教儿童识字的材料，因此也不能算入汉字学范畴。

《左传》中有“于文，止戈为武”，“故文反正为乏”，“于文，皿虫为蛊”的说法。《韩非子》中有“自营为厶”的说法。这些虽然涉及到汉字字形的分析，但这时的字形结构分析还只是为政治而起的一种说教，当然也不能算入汉字学范畴。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把 9353 个汉字“据形系联”，创制 540 部首，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六书”问题作了分析，因而《说文》是汉字学意义上的研究成果。从那时起到现在，汉字学的发展历史已经将近两千年。

从汉字学的内容上看，汉字研究可以从本体结构系统、取向发生系统和文化蕴含系统三个方面着手，分本体研究、体用研究、体艺研究、理据研究等研究课题。另外，汉字学还包括历史汉字研究、字样研究、俗字研究、方言本字研究、汉字传播研究、汉字发展史研究、古今字研究、异体字研究、形声字研究、会意字研究等等研究方向。为适应信息化时代的要求，汉字研究还开辟了各个方面的汉字使用调查与研究、汉字规范化和标准化研究、全汉字库编码研究、古文字数字化处理研究、汉字全息化编码研究等新领域。汉字研究正在经受着时代的考验，汉字学也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发展着。

本教材主要涉及汉字的起源与发展、汉字的性质、汉字学基本理论、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既有浅近的知识介绍，也有深入的专题探讨，以期有助于认识汉字、理解汉字和运用汉字。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讲 汉字的起源与造字取向问题	1
一、汉字起源问题	1
二、汉字的认定	8
三、造字取向	13
第二讲 古文字初阶	27
一、商周文字	28
二、战国文字	37
三、古文字学	43
第三讲 今文字初阶	48
一、隶变及相关问题	48
二、隶书字形特点	53
三、秦汉简帛书	55
四、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字	60
五、宋元明清文字	65
第四讲 现代汉字	72
一、汉字改革	72
二、汉字简化	73

三、汉字规范·····	78
四、现代汉字字形分析与汉字信息处理·····	79
第五讲 汉字的性质 ·····	84
一、近现代学者关于汉字性质的讨论 ·····	84
二、汉字性质认定·····	90
第六讲 字素理论与汉字构形分析 ·····	99
一、字素理论·····	99
二、汉字构形分析·····	107
第七讲 “六书”理论及“三书”说 ·····	115
一、“六书”理论源流·····	115
二、“三书”说及其他观点·····	119
三、“转注”及相关问题·····	124
第八讲 形声字论 ·····	153
一、形声字的来源及类型·····	153
二、近现代形声字研究·····	154
三、形声字的意义来源·····	158
第九讲 异体字论 ·····	166
一、汉字的分化与合并·····	166
二、异形字与同形字·····	172
三、现代学者对异体字的研究·····	175
四、异体字的产生·····	176

第十讲 字词之辨·····	183
一、词的本义、假借义、引伸义问题 ·····	183
二、顾野王《玉篇》中的“字类”问题及其他 ···	188
后 记·····	192

第一讲 汉字的起源与造字取向问题

一、汉字起源问题

关于汉字起源，传世典籍中有不少记载。

《周易》的《系辞传》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郑玄注《周易》：“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治也。”

《老子》第八十章：“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车，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庄子·胠篋》：“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

这些文献材料说的是汉字起源于结绳记事。班吉庆在《汉字学纲要》（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一书中说：“根据许多外国古代记载和近代的人类学、民俗学所提供的资料，世界上许多民族在没有文字以前都曾经过一个用实物帮助记忆的阶段，人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使用过种种方法，有结绳、编贝、刻木、刻石、刻骨、堆土、堆石等等，结绳则是原始民族普遍采用的一种记事法。据记载，古埃

及、古波斯、古代日本都曾有过结绳记事。近代美洲、非洲、澳洲的土人,我国的藏族、高山族、独龙族、哈尼族等也都流行过结绳记事。”李学勤在《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2003年6月)一书中说:“结绳是一种原始的记事方法,有大事就在绳上结大结,有小事就在绳上结小结。这种方法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中都曾使用。如广西的瑶族遇到双方说理,各用一绳,说出一个道理打一个结,谁的结多便能取胜。西藏的僇人邀集宴会,向亲友送绳,以绳上的结数表示宴会在几天后举行。有的少数民族的结绳比较复杂,也用绳结的大小来区别所代表的不同事物。古人的结绳,和少数民族用过的方法应该是类似的,后来才被‘书契’即文字代替了。”

另一些文献则记载了仓颉造字的传说。

《吕氏春秋·君守》:“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

《韩非子·五蠹》:“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谓之公。”

《世本·作篇》:“史皇作图,苍颉作书。”

《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论衡·骨相》:“仓颉四目。”

这些文献说明,仓颉造字的传说至少在战国晚期已经流传甚广。关于仓颉其人,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一中说:“其苍颉则说者不同。故《世本》云:‘苍颉作书。’司马迁、班固、韦诞、宋忠、傅玄皆云:‘苍颉,黄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农、黄帝之间。’谯周云:‘在炎帝之世。’卫氏云:‘当在庖牺苍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牺之前。’张揖云:‘苍颉为帝王,生于禅通之纪。’……如揖此言,则苍颉在获麟前二十七万六千余年,是说苍颉,其年代莫能有定!”

还有的文献把汉字与卦象联系在一起。如《易纬·干凿度》:

“三，古文天字。三，古文地字。三，古文火字。三，古文水字。三，古文风字。三，古文雷字。三，古文山字。三，古文泽字。”宋郑樵在《通志·六书略》中更进一步论说道：“文字便纵不便衡，坎、离、坤，衡卦也，以之为字则必纵。故三必纵而后成水，三必纵而后成火，三必纵而后成《（川）》。”

上述关于汉字起源的传说自古有之，所以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把它们串连在一起：“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义，万品以察。”

对于许慎的汉字起源与发展观，黄亚平在《汉字符号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中提出如下看法：

首先，汉字的起源应该被看成是一种过程，而且也只能看作过程。……文字的形成要从内外两方面去考虑。从文字自身的内因条件讲，文字是在吸收其他艺术手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体系的。正因为如此，八卦、结绳等原始记事符号虽然因为尚未能与语言结合并记录语言，因而不被承认为文字，但由于它们（尤其是八卦）在表达手法上与文字（尤其是文）有异曲同工之处，因而被许慎当成文字的萌芽……

第二，讨论文字的形成，应该注意区分“文字个体”与“文字体系”的概念。我们认为：文字个体的形成大体上与“观象取物”、“依类象形”等图形绘制的方法有关，与结绳记事、刻符记事的记号手法有关，但跟语言中的声音无关，与记录语言无关；文字体系的形成是文字与语言结合的产物，是文字用于记录语言的自然结果。文字个体的数量虽然不少，但与成体系的字符相

比,实在是沧海之一粟。文字个体必然经历了长期的累积过程,逐渐由量变引起质变。之所以产生飞跃,那还跟记录语言的需求有极大的关系。

第三,“记录语言与否”是衡量文字体系形成的最根本标志。单个的文字个体可以是一幅画、一种图腾形象、一个记号,它可能是原始人敬畏、崇拜的对象,可能是原始人寄托情感,表达心愿的工具,也可能是他们区分彼此,标明所有权的符号。这种对象、工具、符号都可以表情达意,但并没有跟语言中的意义直接挂钩,更不是表达语言中的语词。文字体系是复杂的巨系统,成分不纯,来源不一,能详尽而无遗漏地记录语言中的词,有相对稳定的排列次序,能够按照语言的规则表达语言。两者是根本不同的。单个的文字个体上升为成系统的文字体系之成员,是一次质的飞跃。它由巫师通神的载体,民众崇拜的对象摇身一变成为社会人群交际的工具。正是在这一变动中,文字完成了由表意到记事、记言的转变,日益紧密地与语言结合在一块,成为语义延宕的最好承载者。当然,在文字个体与文字体系阶段还存在相当长的亦此亦彼、彼此混淆的中间阶段。

第四,所谓“仓颉造字”并非是白手起家,而是有所承继的。《荀子·解蔽篇》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章太炎《检论·论文·论造字之起源》亦云:“文字源流极久,而仓颉独传者,仓颉其人能划一之,统一之。”正是这个意思。归于仓颉名下的“文”,恐怕大部分为前代所创,仓颉只起了整齐归类并颁布实行的作用。把某一种重大发明归功于某一个特殊人物或者由代表官方的皇帝指派某个人物去完成,这种情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屡见不鲜的现象。如黄帝时期的大桡作甲子、容成造历、伶伦造律吕、隶首作算术;后代的蔡伦造纸等

等。我们推想：仓颉对前代无数巫师所造之文（文字画）大概是熟悉的，因此，他具备了继承前代之“文”的条件。许慎对这一点是坚信不疑的，所以他才对俗儒鄙夫淆乱仓颉古文的做法表现出极大的愤慨。章太炎对这一点也是坚信不疑的，所以他有《文始》，有所谓“初文”、“准初文”的说法。只是他们二人对造字传说的理解未免拘泥，而且都想找到文字产生的唯一源头，以便于梳理文字变异之流，多少有点理想化。我们认为，如果真有仓颉其人其事，那么，仓颉所造之“字”，大体上是对史前文字意象表达手法的肯定和对史前视觉符号与有声语言日益结合事实的确认，他的工作重心大概会放在整理已有之文的图形并确定他们的读音上。

现代学者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把殷墟甲骨文看作是已知的最早的文字形式，把文字的起源归于图画和刻符。

班吉庆在《汉字学纲要》（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一书中说：“大量的考古发现已证实，图画的生产比文字早得多。世界上几种古老文字，如苏美尔人的楔形字，古埃及的圣书字等，它们字形的原始形式，都和汉字一样，是图画性的。这说明人类文字起源有共同的规律，即文字脱胎于图画。……原始人的绘画，常常以渔猎的对象和劳动的形象为题材，这正是图画产生于劳动的证据，文字画是图画发展成文字的第一步。在成熟的文字产生以前，我国原始人的绘画已经相当发达，例如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些彩陶，上面的图案、动物等画得很好，与后来的文字也很相像（如下图）。”

	彩陶上的图画	金文族名	甲骨文	金文
鱼图				
蛙眼图				
鸟隹图				
鹿图				

《汉字学纲要》还说：“早期创造的汉字主要是象形字和指事字，它们的图像性很强，也说明是受到图画的启发，从图画脱胎而来。从图画到文字画，又从文字画质变为图画文字，再发展成文字体系，其间必然经过若干人的漫长的集体创造。一个字创造出来以后，只要被社会公认，必然传播开去，流传到后代，也就约定俗成。经过千百年的积累，才可能出现能记录整句话、整段文辞的文字体系。”图画→文字画→图画文字→文字体系，这看上去是个汉字由起源到成熟的有序的演进序列，但在实际分析汉字问题时不具有任何可操作性。“文字画”与“图画文字”这些术语只是学者构拟出来的汉字起源与发展的理想序列中的两个模糊的跳板，是学者试图把文字与图画区别开来的无效手段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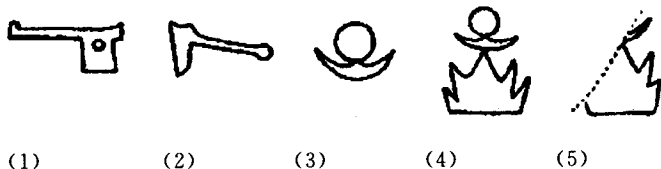
关于刻符的问题。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在一些古文化遗址上陆续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古陶符号。如山东省章丘县城子崖出土的龙山文化陶片上发现有一些符号。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地出土的仰韶文化陶器符号有一百多例，其中有的符号结构较复杂。



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陶器符号

这些较复杂的符号很容易与文字联系在一起,学者比较重视,也多有讨论。如郭沫若在谈到半坡的刻划符号时说:“刻划的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押或者族徽之类。我国后来的器物上,无论是陶器、铜器或者其他成品,有‘物勒工名’的传统。特别是殷代的青铜器上有一些表示族徽的刻划文字,和这些符号极相类似。由后以例前,也就如由黄河下游以溯源于星宿海,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前些年在山东莒县、诸城出土的大汶口文化的陶尊上发现一些刻划符号,有的符号形体接近商代的青铜器铭文,不少学者认为就是文字符号(见下图)。于省吾把(1)(2)释为“戊”字,把(3)(4)释为“旦”字;唐兰把(1)释为“戊”,(2)释为“斤”,(3)(4)释为“灵”;李学勤把(1)释为“戊”,(2)释为“斤”,(3)释为“灵”,(4)释为“灵山”。裘锡圭对此持谨慎态度,他认为“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的作风跟古汉字很相似……已经用作原始文字的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当然,这只有在发现了用这种符号记录(可以是很不完整地记录)成组成句的词的实例之后才能证实”。这个观念没有离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个命题。



大汶口文化陶尊刻符

李学勤在《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 2003年6月)中还提到“有些少数民族过去也使用过刻划符号, 虽然不是在陶器上, 但符号的形体颇与仰韶、龙山的陶器符号近似。居住在云南、四川的普米族的刻划符号, 学者划分为占有符号、方位符号、数字符号三类。有的符号已有较固定的形体, 如以日形表示东方, 和汉字的‘东’‘从日在木中’取意一致。普米族的符号可以说有形有义而没有音, 如将其形统一确定, 再与一定的音结合, 就形成了真正的文字。古代文字的产生过程可能就是这样, 而陶器符号的发展是这一过程的反映。”

二、汉字的认定

什么是汉字?“汉字是汉民族使用的文字。”“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汉字有哪些特点?“汉字是形音义统一体。”“汉字是表意的。”“汉字的结构比较复杂, 分字、构件、笔画三个层次。”这些命题无疑关乎汉字的本质问题, 它们甚至可以成为判定字与非字的依据。上文所说的裘锡圭先生对于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的认识显然就是基于“文字是记录语言的”这个前提条件而作出的理解。

高明曾经在《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上发表《论陶符兼